

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及其意义^{*}

杨小柳 胡敏哲

自中国共产党建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展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的科学探索,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为理论基石,以农民社会和少数民族为主要研究议题,以实地调查为研究方法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道路。从学术的角度去回顾和总结,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 中国共产党人 革命时期

作者杨小柳,女,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胡敏哲,女,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地址:广州市,邮编 510275。

在既往的学术研究中,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问题与农村问题所进行的研究及其贡献,存在着不同的研究视角,主要包括党对民族问题认识的发展过程研究,^①党的具体民族政策及其实践研究,^②党的农村调查之历史事实、调查思想、报告文本的研究等。^③上述研究大多为针对革命的特定阶段、围绕党所关注的某个问题领域所开展的专题性研究,而从学科史的角度,直接把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问题研究、农村问题研究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发展联系起来的研究成果则较少。应该说,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 28 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革命实践中,曾经围绕不同阶段中国革命面临的主要问题开展过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活动,这是我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常有必要在系统史料收集和整

* 本文个别观点吸纳整合了匿名评审专家和《民族研究》编辑部的意见,特致谢忱!

① 参见周昆云:《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少数民族的认识》,《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王继、郭林:《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创新》,《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周云水:《地方性知识与延安时期的民族问题研究》,《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潘先林:《红军长征与“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国家”理论的提出》,《民族研究》2016年第5期。

② 参见阎丽娟:《党的民族政策与红军长征的胜利》,《兰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郝琦、冉春嫒:《延安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及其实践》,《延安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王纪鹏、刑瑞娟:《浅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理论月刊》2011年第12期;周竞红:《红军长征时期中共中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实践》,《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③ 参见孟庆延:《理念、策略与实践:毛泽东早期农村调查的历史社会学考察》,《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4期。

理的基础上,深入发掘这一系列研究活动对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意义。

本文旨在阐明,自中国共产党建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所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实践,历经萌芽时期、探索时期、转折时期和成熟时期,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为理论基石,以农民社会和少数民族为主要研究议题,以实地调查为研究方法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这一学术脉络在中国的开创、形成和发展。这些实践活动产生了一系列的理论成果和应用成果,为探索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核心宗旨的学科发展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萌芽时期: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理论的引入与传播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便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引介与传播活动。马克思主义作为当时的一种观念创新,与此前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的资本主义器物改良、制度改良和资产阶级革命相比具有更多优势。由于“一战”的爆发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而十月革命的胜利又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能够引领落后国家取得革命胜利,这使其在当时众多的西方思想流派中脱颖而出,自五四运动后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介绍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单纯的学理探讨,而是为了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为担负起改造中国的历史使命寻求和掌握科学的理论。^①因此,他们特别重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

(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引介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深受当时民族学人类学古典进化学派的影响。为了对人类社会形态演进序列进行科学论述,马克思对人类学古典进化学派科瓦列夫斯基(M. Kovalevsky)、摩尔根(L. H. Morgan)、梅恩(H. J. S. Maine)、拉伯克(J. Lubbock)、菲尔(J. B. Phear)等学者的著作进行了摘录和评论,特别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予以高度关注,写作了《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民族学人类学笔记,撰写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指出家庭、私有制、国家并不是人类自古就有的,而是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阶段。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民族学人类学古典进化学派的进化观在很多方面的论述不尽相同,但民族学人类学进化学派的研究成果,成为一种事实依据,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提供了生动的具体事例,补充和证实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②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后,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翻译与传播工作。一是翻译经典原著。共产党员杨贤江化名李膺扬,根据英译本并参考日译本,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译为中文,书名译为《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之起源》,1929年作为社会科学名著译丛之一,由上海新生活书店出版。^③二是开办学校,开设相关课程。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开办上海大学,由瞿秋白、施存统等人讲授社会学、社会思想史、社会运动史等课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49页。

② 参见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4—45页。

③ 参见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1903—1949),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页。

程,蔡和森讲授“私有财产和家庭制度的起源”课程。^①三是发表有关著作。蔡和森撰写了《社会进化史》(1924年由民智书局出版),运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基本原理来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对摩尔根的学说进行介绍,《社会进化史》被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最早著作”;^②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达,撰写了《现代社会学》(1926年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现代社会学》中辟有两章专门讨论家族和氏族,体例和观点均依照《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③

早期的共产党人,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形态进行研究。“半封建”或“半封建社会”的术语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④列宁用“半封建”^⑤“半殖民地”^⑥两词来形容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蔡和森于1922年9月在《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中,明确使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两个概念。^⑦1939年12月,毛泽东主持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指出认清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和主要矛盾,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⑧早期共产党人对社会形态的研究,在当时很有现实意义,今天仍然值得肯定。

(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基于俄国经验的民族问题阐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高度关注人类社会的不平等问题,把民族不平等作为人类社会不平等的重要表现形式。二人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民族不平等的根源在于阶级不平等,而解决民族剥削与对立的根本途径,就在于通过社会革命,消灭“人对人的剥削”以及“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⑨从而在理论层面,把民族不平等与阶级剥削、社会革命联系起来。十月革命前后,列宁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论,针对资本主义殖民体系下民族压迫现象及俄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民族平等”“民族自决”“联邦制”等民族纲领和政策,以解决实践中的民族问题。

建立之初的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问题的论述及俄国的民族纲领和政策指导下,对中国的民族问题进行了初步阐述,在中共“二大”宣言中提出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奋斗目标。在这一时期,党对民族问题的阐述,以纲领性论述为主,缺少具体的政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掌握科学理论才能正确把握前进方向。”^⑩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研究,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改造中国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这种鲜明的实践品格,与中国共产党人社会研究的宗旨是高度契合的。建党初期至1927年前后,可以被视为中国共产党人

① 参见黄美真、张云、石源华:《上海大学史略》,《复旦学报》1981年第2期。

② 参见欧潮泉:《解放前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

③ 参见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1903—1949),第92页。

④ 参见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9页。

⑤ 参见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9页。

⑥ 参见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6页。

⑦ 参见蔡和森:《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88页。

⑧ 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

⑨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0页。

⑩ 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0/21/c_1119765804_2.htm,2016年10月21日。

民族学人类学实践的萌芽时期。在此阶段中,虽然尚未看到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广泛开展,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已经掌握了民族、文明、进化、私有制等现代民族学人类学概念。更为重要的是,以民族学人类学古典进化学派著作的经验材料为论证支撑,与社会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让中国共产党人明确认识到社会文化变革的必然性,成为指导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斗争的重要思想武器。这一时期党对民族问题的纲领性陈述,开启了党对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探索历程,党对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的认识,也从此走上了日渐成熟的道路。

二、探索时期:从农民社会实地调查中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

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人为寻找革命的新道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从大革命失败到井冈山斗争的这段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学人类学实践的探索时期,其实践活动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共产党人开始将农民社会作为重要研究对象,开创了独树一帜的中国农村调查,突破了当时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只研究简单的原始部落社会和初民社会的局限;二是在对农民社会的研究中,探索出一套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这些学科实践活动迈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中国化的坚实步伐,并且与革命实践探索相结合,使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本质所在,推动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对中国革命走上胜利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在民族学人类学的学术脉络中,中国是以一个有着悠久农业文明传统、复杂的农民社会这一学术形象出现的。因此,无论是早期进入中国的西方学者,还是接受了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学科训练的中国学者,都把研究目光投向了中国的农民。事实上,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很早就对农民问题予以关注,与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的许多研究方法不谋而合,他不仅接触了西方学术理论与方法,而且针对农民问题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这些前期积累,为探索时期大量农村调查的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田野基础。

早年间,毛泽东一边阅读杨昌济的《西洋伦理学史》、蔡元培译的《伦理学原理》、严复译的斯宾塞著作《社会学研究》等书籍,一边阅读“无字之书”,游学宁乡、安化、益阳、沅江诸县,深入中国农村社会开展调查研究。1923年,中共三大上,毛泽东郑重提出了农民的问题,并负责起草《农民问题决议案》。1924年12月,毛泽东回到家乡韶山,做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利用原有族校创办了20多所农民夜校,继而推动成立20多个乡农民协会。

大革命时期的斗争形势,使中国共产党人清晰认识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和工人阶级的孤立无援,从而逐步确认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1925年秋,毛泽东及时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写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明确提出了“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的观点。^①1926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将农村居民分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贫农、贫农、雇农、乡村手工业者以及游民等各阶级,并就各个阶级对革命的态度进行了分析,初步形成了关于农村阶级分析的理论。^②1926年9月,毛泽东发表了《国民革命

^① 参见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② 参见毛泽东:《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中国农民》1926年第1期。

与农民运动》一文,论述了农民运动与国民革命的关系,指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①同年,毛泽东把对湖南湘潭西乡佃农张连初的调研访谈结果写成了《中国佃农生活举例》,这篇对农民生活的调查报告揭示了当时中国佃农痛苦、贫困的整体生活。^②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由广东开始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为了回应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国民党右派以及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对农民运动的责难,1927年,毛泽东在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开展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烈赞扬了农民运动的伟大功绩,阐明了农民斗争与革命成败的密切关系,指出农民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是国民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反驳了党内外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③

大革命失败后,随着“土地革命”方针在党的八七会议上的确立,以及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党的工作重点从城市转移到了农村。为了更好地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与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开展了大量的农村调查,并写成了许多农村调查报告。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寻乌调查》(1930年5月)、《兴国调查》(1930年10月)、《东塘等处调查》(1930年11月)、《木口村调查》(1930年11月)、《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等。这些调查,既有专题性调查,也有综合性调查;既有具体问题分析,也有典型经验总结。总体来说,这些农村调查主要关注的内容有如下几项:一是城乡社会的真实状态。通过分析城乡经济结构,观察城市贫民与农村家庭等,勾勒出中国小城市和乡村社会的生活图景。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分析农村社会的阶级关系,对土地斗争中农村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手工工人、商人、游民等各个阶级的经济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农村的人口结构与土地关系。三是农村土地斗争的开展情况。通过分析农村土地的分配方法、分配状况以及存在的争议,总结土地革命的实践经验,根据不同阶级确立了不同的政策。四是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经验。通过实地调查,总结和推广基层政权建设的先进工作经验。

这一系列调查研究,反映了毛泽东不仅是一个思想家、军事家和政治家,而且非常重视实地调研。这些报告调查严谨、资料丰富、观点鲜明,具有极强的科学性,反映了当时中国革命存在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策略与方法。事实上,毛泽东始终非常强调调查的目的性,认为不能为研究而研究,指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④毛泽东农村调查“问题意识”的变化,也反映了共产党人对农村和农民问题认识的由浅入深。大革命时期的调查主要关注农民的生存状况及农民运动的发展情况,这些调查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揭示了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这一事实;井冈山时期的农村调查则进一步聚焦到农村的土地关系、土地斗争上来,这与八七会议上明确的“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这一论断密切相关。这种鲜明的问题意识,直到今天仍有重要的意义,它启发民族学人类学工作者应该面对现代中国社会做田野调查,勇于介入社会主流问题,为推动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随着上述一系列农村调查的开展,毛泽东也探索出一套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调查方法。1930年,毛泽东总结自己对调查的心得体会,写成《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了“没有调

① 参见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② 参见毛泽东:《中国佃农生活举例》,《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34页。

③ 参见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2—44页。

④ 参见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页。

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调查宣言。20世纪20—30年代的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方法,诞生于并主要应用于结构—功能主义视野下的简单部落社会和初民社会研究。而毛泽东的这套研究方法,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理论的指导下,在丰富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产生的,是针对复杂的中国农村社会而构建的,是对一般性的调查理论方法的调整和改造。比如,毛泽东多次运用小组座谈会这种半结构性的集体访谈方式来收集资料和研究问题,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对小组座谈会的调查对象、调查内容、调查素材处理等问题做了详细阐述;又如,在方法论层面,毛泽东强调要重视“下马看花”,认为初次从事调查工作的人,要做一两回深入的调查工作,在深切了解一处地方或者一个问题的基础上,之后调查别的地方和问题才能容易找到门路。^① 这些可以视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田野工作规范的重要说明,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中国化的具体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② 调查研究是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问题的钥匙,是党制订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从这一时期开始,共产党人将调查研究作为重要的工作方法,不断将工作实践和经验总结与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理论相结合,形成了实事求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重要认识论基础,并不断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中国的国情和社会状况相结合,不断积累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实践经验,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中国化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三、转折时期:少数民族进入共产党人的研究视野

在长征时期,少数民族开始进入共产党人的研究视野。在此之前,党在苏联模式和共产国际指示影响下,对民族问题进行了纲领性的论述,但党对中国的民族实际并没有深刻的了解,也没有把少数民族问题放在革命斗争的重要地位。长征途中与少数民族的直接接触,使得党开始切实关注民族问题。掌握少数民族的实际生活情况、化解民族隔阂、消除少数民族对党和红军的疑惧情绪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当务之急。

从1934年10月实行战略性转移开始,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短短两年间,中国共产党发布了大量涉及少数民族工作的政策文件,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1934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布告》(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区政治部:少数民族工作须知》(1935年5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草案)》(1935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1935年8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1935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1936年5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宣言》(1936年5月)等等,足以反映党在这一时期对民族问题的高度重视。

长征时期,党和红军每到一处,都通过扎实的实地调查,了解、分析当地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况。这些调查,采用了与人类学“整体观”类似的研究范式。与在根据地时的调研相比,“问题

^① 参见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11页。

^② 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学习时报》2011年11月21日。

意识”更为广泛,关注到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如《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区政治部:少数民族工作须知》(1935年5月)详细介绍了四川省内藏人、回人、“番人”、苗人、“倮倮”等少数民族的分布区域、生计模式、宗教信仰、语言文字、阶级划分等情况;^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对番民的策略路线的提纲(供党小组讨论用)》(1936年5月29日),集中回答了“那些地方有番民,他的总数有好多”“番民有几种不同的名称”“番族区域社会经济政治与汉族区域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番人有什么特殊的风俗习惯”等问题。^②

在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制定并实施了合理的民族政策。一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民族问题论述的基本观点,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红军每到一处,都向少数民族大力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主张。比如,《对苗瑶民的口号》(1934年11月)中明确提出“实行民族平等,在经济上、政治上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③又如,朱德在《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宣告“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④此外,党的领导人还身体力行,主动团结少数民族和宗教上层人士,如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结盟,贺龙亲临云南中甸喇嘛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等,消除了少数民族民众对红军的疑惧。

二是基于对我国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全面了解,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予以充分尊重。比如,《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关于回民区域政治工作》(1935年)要求“进入回民区域,应先派遣代表同阿訇接洽,说明红军北上抗日意义,获得回民许可后,才准进入回民乡村宿营,否则应露宿”;“保护回民信教自由”;“不准借用回民器皿用具,各部在回民地区不得吃猪肉、猪油”。^⑤又如《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1935年)要求全体战士“遵从少数民族的宗教、风俗、习惯,如回教不吃猪肉,夷民的男女授受不亲,黑夷之敬重灶君等等”。^⑥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为帮助少数民族社会发展,还制定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经济建设、少数民族教育文化建设等民族政策。

三是在实践中逐步确认了在统一国家中实行民族自治的主张。1935年5月,红一方面军进入四川大凉山冕宁彝族区,帮助彝族人民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和革命武装力量——冕宁县革命委员会以及冕宁抗捐军;同年,羌族人民历史上第一个自己的政权——四川茂县苏维埃成立,随后,汶川、理县苏维埃也相继成立;1936年8月,红军在甘肃、宁夏交界的豫旺、海原一带建立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县各界群众代表大会通过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条例》,这是党的民族自治纲领第一次得到实现。

长征时期是早期中国共产党民族学人类学实践的转折时期,其研究对象从汉族农民社会转移到少数民族社会文化上来。红军在长征期间转战11省(区),与苗、瑶、藏、回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接触,这相当于开展了一场大规模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积累了丰富的少数民族知识和调查资料。这一时期以少数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民族

① 参见《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区政治部:少数民族工作须知》,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280页。

② 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对番民的策略路线的提纲(供党小组讨论用)》,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369—371页。

③ 参见《对苗瑶民的口号》,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246页。

④ 参见《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277页。

⑤ 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关于回民区域政治工作》,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344页。

⑥ 参见《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339页。

学人类学实践具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坚持与贯彻，使得党提出的“民族平等”主张超越了资本主义国家民族平等的形式化和抽象化，实现了各族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具体权利上的平等；二是共产党人在对少数民族的调查中深刻感知了我国多民族的实际国情，在对民族问题的认识中摆脱了建党初期“五族共和”以及苏联“民族自决”“联邦制”等观念的局限，推动了日后包括“中华民族”的理论思考和“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在内的一系列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成果的诞生。

四、成熟时期：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道路的形成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建立人民政权，不断扩大执政区域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科学实践的成熟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研究的特点，一是延续和发展了农民社会研究、少数民族研究等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传统课题，二是在上述研究与革命实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形成了党在局部执政时期的相关土地政策、民族政策，这些区域性的试点和范例，为党从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奠定了政治基础。这些研究以实地调查为研究方法，结合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党自建立以来所形成的对中国社情民情的深刻理解，产生了大量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成果和应用成果，走出了一条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科学研究道路。当时的理论探究虽非纯粹的学术研究，但其科学方法、求实精神、探索劲头、理论水准，非常值得今天一并纳入学术的范畴进行总结和思考。

（一）少数民族研究与“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形成

陕甘宁边区复杂的民族地理环境以及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开展民族分裂活动的斗争形势，使得党中央意识到系统研究、解决民族问题的迫切性。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将“团结中华各民族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确定为民族工作的总任务。^①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开展民族问题的调查研究。

首先，中国共产党人就如何认识“中华民族”给出了自己的阐述，回应了当时学界的讨论。1939年，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主张，认为“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②对此，费孝通则回应道，“我们不必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③中国国内的汉、满、蒙、回、藏、苗、瑶等具有不同祖先、语言和文化传统的群体都应该被看作是“民族”。顾颉刚的观点，代表了传统历史学家对统一的中华民族的演变历史的理解，以及对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认识，尤其是在日本建立“伪满洲国”和鼓动“内蒙古自治”的严峻形势下，对帝国主义分化瓦解中国的担忧。而费孝通的观点，则代表了当时受西方人类学理论影响、具有少数民族田野调查经验的青年人类学者，对群体之间体质、文化和语言差异性的重视与关怀。^④

对此，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

① 《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摘录)》，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608页。

②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年2月13日。

③ 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年5月1日。

④ 参见马戎：《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国除了汉人外,还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悠久的历史。此文明确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的理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同在一国的中华各族的总称。这不仅回应了学界关于“中华民族”的主流观点,而且有力地维护了统一国家之下“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主张,“从而为处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提供了一体多样的历史和现实图景”。^①

其次是设立研究机构,重点开展蒙古族、回族研究。1938年,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下称“西工委”)成立,西工委专设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室,下设蒙古问题研究组和回回问题研究组,负责调查民族历史、现状和问题。^②1941年7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西工委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室的基础上组建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下设研究室。1941年9月,延安民族学院成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民族问题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研究处。1942年1月,西北局成立第四分局少数民族研究室,附设在延安民族学院内。^③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分别开展三次针对与陕甘宁边区相邻的蒙回民族的实地调查,产出了一批调查报告和专著,如“伊盟及宁青蒙旗武装调查”、“蒙旗教育现状调查”、“1940年蒙古情况调查”、《青藏调查记》、《乌审旗调查》、《土默特旗调查》等。^④特别是1940年4月、7月,西工委民族问题研究室为党起草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⑤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⑥,介绍了回回民族和蒙古民族的历史来源,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具体地阐明了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指导下党对蒙回民族的纲领、政策。除了蒙回民族外,这一时期的研究专著还涉及其他少数民族,如石国保的《简谈中国苗族》^⑦,韩晋的《藏族和西藏》^⑧,韩戈鲁的《唯吾尔》^⑨,朱青的《西康宁属的夷族》^⑩等。以《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研究成果,继《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后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问题的立场:一是少数民族在聚居的地方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利;二是少数民族必须在国家认同问题上毫不动摇。对照当时学界顾颉刚、傅斯年和费孝通、吴文藻所提出的方案,共产党人的理论思考既没有否定中国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也没有忽视“民族身份”在民族主义时代对多民族国家的可能挑战。^⑪

最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对多民族国情的认识,结合长征时期积累的民族理论与工作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1941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提出“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

① 张太原:《抗日战争与中共的中华民族观的形成》,《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3期。

② 参见李维汉:《回忆延安时的民族工作——纪念贾拓夫同志》,《民族研究》1981年第1期。

③ 参见宗群:《回顾与展望——从延安民族学院到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教育研究》1994年第2期。

④ 参见贺小娜:《刍议陕甘宁边区的民族研究机构及其影响》,《延安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⑤ 参见《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648—656页。

⑥ 参见《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657—667页。

⑦ 参见石国保:《简谈中国苗族》,《解放日报》1941年9月26日。

⑧ 参见韩晋:《藏族和西藏》,《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8、19日。

⑨ 参见韩戈鲁:《唯吾尔》,《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7日。

⑩ 参见朱青:《西康宁属的夷族》,《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日。

⑪ 参见华涛:《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思路及其当代意义——关于长征及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发展的研究》,《民族研究》2016年第5期。

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①是党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制度化、法律化的最早的正式文件。随后,中国共产党人在三边分区的盐池县回六庄、定边县的西门外和二区杜家井、陇东分区的曲子县三岔镇、关中分区的正宁县一区等地先后建立了6个回民自治区,在伊克昭盟南部的鄂托克地区建立了城川蒙民自治区等民族自治政权。^②这些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为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的完善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提供了试点和范例。

(二) 农民社会研究与农村政策的再思考

在延安时期,为了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教育全党学会理论联系实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党中央号召开展整风运动。基于此,党中央出版了毛泽东《农村调查》一书,重申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1941年8月,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党进行调查研究,掌握中国社会情况。由此,党内形成了一股比起纯粹的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规模更广的调查研究之风。

一是党中央成立了中央调查研究局,负责国内外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及社会阶级关系等主题的调研工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已受到共产党人高度重视的农民土地问题再度进入了研究视野。1943年,中央调查研究局对佳县、米脂县、绥德县等地的减租斗争进行了调查,并撰写出研究报告。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起草了《土地租佃条例草稿》《土地登记办法及说明》《土地所有权条例及说明》等与土地关系、土地斗争相关的政策文件。^③这些调查研究与抗日战争时期党对土地政策的再思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联合地主阶级共同抗日,在土地政策方面做出调整,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政策,减轻农民所受的封建剥削,同时实行交租交息,团结各方力量开展抗日斗争。

二是组成了各类调查团,开展各种特定主题的实地调查活动。其中以张闻天率领的“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持续时间最长,研究成果最丰富。从1942年1月至1943年5月,调查团先后到陕北神府县直属乡8个自然村,米脂县杨家沟村,晋西北兴县二区14个自然村等地调查。调查的重点是陕北和晋西北根据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调查团采用深入村庄按户调查的方式,通过与农民的深入访谈,掌握了农村家庭的土地、牲畜、农作物、农具等生产资料的具体数据,并围绕阶级关系、土地占有与租佃、村政权工作等问题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在深入分析调查材料的基础上,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趋势做出估计。随着调查工作的深入开展,调查团先后完成了《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④《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⑤《米脂县杨家沟调查》^⑥等报告。这些调查报告,体现了共产党人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思考,揭示了发展生产力是中国革命的主线和目标这一重要事实。

(三) 延安地区“地方性知识”的研究与应用

20世纪40年代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形成了约四万人规模的知识分子群

①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摘录)》,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678页。

② 参见林伯渠:《陕甘宁边区建设的新阶段(摘录)》,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037页。

③ 参见李小娜:《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的实践述评——基于1941—1945年的调查研究资料》,《传承》2013年第11期。

④ 参见张闻天:《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7—91页。

⑤ 参见张闻天:《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93—122页。

⑥ 参见张闻天:《米脂县杨家沟调查》,《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123—270页。

体。陈伯达、张如心、张仲实、杨松、艾思奇、和培元等人，长期注重地方民间文化资源的收集，其研究旨在将民间文化的“平民主义意识”改造为提供革命所用的新文化形式。在文化改造过程中，这些知识分子广泛接触了与人类学知识近似的“地方性知识”，并做了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延安地区的地方性文化，如秧歌、说书等各种戏剧表演形式，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宣传各项政策的重要工具。为了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作用，使广大知识分子树立马克思主义观，特别是掌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实现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知识分子也接受了教育改造。毛泽东就曾告诫文艺工作者要到人民生活中去，不可眼里根本没有工人农民；^①1942年中共中央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明确提出文艺工作的根本问题是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②鲜明地提出文艺是为群众服务的。这也对知识分子的社会研究提出了新要求，对延安时期的民族学人类学实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总体而言，从学术视野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前期学习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经典著作，创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并对中国农村与少数民族有深刻认识的基础上，走上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科学探索道路：在以理论联系实际为目标的整风运动背景下开展的农村调查，进一步印证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中“生产”概念在文化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明确了发展中国农民社会生产力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与抗日战争时期党对土地政策的调整紧密相关；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平等”主张以及对多民族国情认知而提出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突破了苏联“联邦制”和“民族自决”政策的局限性；而知识分子对“地方性知识”的研究和改造，则进一步促进了党的土地政策和民族政策在陕甘宁边区的宣传。这一时期所产生的理论成果、应用成果，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的中国化。在现实层面，延安时期党在陕甘宁边区所实行的各种纲领、政策，尽管实行范围较小、运作尚不成熟，但其为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土地政策、民族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五、结 语

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在20世纪20—40年代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大量西方经典理论著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各类专门化的研究机构相继设立，许多学者在全国各地开展田野调查和研究，这一时期因而也被称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早期发展的“黄金时期”。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和民族学人类学学者的实践活动作为这一时期科学研究的两条重要主线，呈现出并行发展、偶有交汇，同时又各具特点的基本状态。

从研究目的来看，当时的民族学人类学者和中国共产党人都怀抱了解中国、兴国救民的初衷，但在研究目的上存在学术研究的理论取向和实践取向的明显差异。费孝通的引导型文化变迁，^③杨成志的彝族调查渴望达成的“促进民族主义的实现，‘对外求中国在国际上平等，对内求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融洽民族观念，打破‘汉夷观念’”，“维护边陲”等目标，^④都

① 参见龚云：《延安时期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红旗文稿》2015年第17期。

② 参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0页。

③ 参见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④ 参见李培、黄淑嫔、王建民：《他无愧为中国人类学先驱》，《南方日报》2011年1月26日。

反映了当时的民族学人类学者学术报国的理想。特别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学界围绕抗日救亡重点开展的边疆民族研究,更是体现了学者们对这场全民族斗争的全力投入。但是,当时的学界研究主要围绕一系列事关民族救亡的社会问题和关键人群开展调查分析,在理论层面思考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出路。相比而言,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进行革命实践的政党,突出的“问题意识”使其自觉运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去了解和面对的现实,其目的就是要为实现革命目标打下认识论基础,其研究与一系列社会变革、打破旧制度的实践紧密结合。

从研究立场来看,两者均捕捉到这一时期中国革命的根本性问题,把农民和少数民族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却从不同立场出发思考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当时的学者大多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研究中国社会,所沿袭的英美民族学人类学学说具有改良主义的保守倾向。^① 这些学派虽然对资本主义社会和制度有所批评,但总体上仍持肯定的态度。当时所流行的社会团结论、社会平衡论等都认为人类社会的文化自成一体而不应被加以破坏,由此进一步加剧了当时的学界忽视社会变革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人则始终站在新兴阶级立场进行研究,其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主张社会革命,彻底消灭私有制、推翻旧社会制度。

从理论路径来看,二者的差异更为明显。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阶级分析法、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分析法等新的分析工具,并在毛泽东、张闻天的农村调查,红军长征时期对少数民族社会的调查中得到了应用和发展。与此相对,当时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普遍接受的英美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则大多强调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等文化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这就使当时的学界研究始终难以聚焦在事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议题上,在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法、工具等方面都有所欠缺。

总而言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时期就非常注重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引,以实地调查、调查研究为工作方法,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中国国情、革命实际相结合,不断积累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实际经验,成功解决革命斗争过程中的民族问题、土地问题等现实难题,创造了丰富的、非常具有原创性的民族研究、农村研究成果,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等重大原创概念,摸索出了一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研究道路。当然,中国共产党人的研究视野更为开阔,还成功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辉煌成果,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和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奠定了重要的理论、思想和社会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共产党人早期的民族学人类学实践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实践过程,是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本土化的重要融合途径,在中国革命史中具有重要意义。今天从学术的角度去回顾和总结这一段历史,一来把中国共产党人早期的民族学人类学科学研究实践梳理清楚,有利于正本清源,理直气壮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二来有利于汲取智慧和营养,立足当前的国情、民族区域自治、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实际,展开进一步的科研探索,为更好地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科研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做出新贡献。

〔责任编辑 刘海涛〕

^① 已有学者指出,早在1949年,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学者在于燕京大学举办的座谈会中,便对当时民族学人类学的这一改良主义倾向做出了检讨与反思,具体参见杨圣敏:《中国民族学社会学界69年前的反思及其当代意义》,《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